

《雷波》的由来

阿卢黑格

在历史上，在现在的雷波处，有三个巨大的石包，这三个石包自然形成了，锅庄的样子，当地人给他取名为呷尔莫簸（𐄌𐄎𐄏𐄐），因而在彝族人民中从古至今广喊为“呷尔莫簸”这就是历史的依据和见证。在彝语里，呷尔（𐄌𐄎）是锅庄的意思，尔语阿莫（𐄌𐄎𐄏𐄐）是巨大的石头，簸（𐄌𐄎）是三块石头聚山。译成汉语时，只译了“卑水”（𐄌𐄎𐄏𐄐、象山）“罗播”b（𐄌𐄎𐄏𐄐，三石在作战时可作为隐蔽还击之地）“卑水”“莫簸”“磨坡”“么簸”等字音，觉得不大好，后改译（移）为雷波。

这三个石包的石质很好，后来被挖去修筑石城墙去了，巨石挖完后，留下一个大凹。由于彝汉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隔阂越来越深，雷波城的水源被彝族头人断过几次，城里人吃用水十分困难。人们干脆把这个大凹用来储水，就是现在的雷波凹（此凹现位于雷波县委机关内）可惜的是，石城墙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被拆毁了。

“注”以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字音呢？因用汉字写彝语，写不准确而造成的。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雷波文史（第一期）

目 录

雷波的由来	（三）	10元	阿卢黑格
雷波农民暴动亲历记（一）	（一）	20元	文 健
土司制度的由来	（三）	10元	王德森
雷波历史人物穆渡洲的发迹和起义经过	（二）	15元	江国梁
民国时期工商管理机构的演变	（二）	15元	殷联辉
雷波的禁烟事件	（二）	15元	杨文思

雷波县农民暴动亲历记（一）

文 健

在三十年代初，雷波县曾经连续相次发生驱逐县长的农民起义。我是参加起义的亲历者。现将驱逐县长吴峻之的情况，记述如下：

这次起义虽不是共产党上级组织直接领导的，但确是在受到共产党员杨韬和廖旭龄的影响下发动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对贪官巫吏是个打击。

一、起 义 情 况

1929年，雷波青年黄昌俊到乐山，经友人介绍在嘉州书店当了店员。这个书店是黄埔军校毕业、二十四军驻乐山部队王麟生团的一个连长廖旭龄出资开办的。书店经理杨韬是共产党员。经他二人介绍，黄昌俊于1930年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不久，书店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于1931年初被查封。查封书店时杨韬没有被抓住，仅黄昌俊被拘关进乐山监狱。黄昌俊被关了两个多月，因无人指名控告，得以“查无实证”而获释放。黄昌俊出狱后，廖旭龄认为他在狱中受审时表现不错，就送他到成都进了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黄昌俊在政治学校毕业后，又因廖旭龄的关系，被派往马边任二十四军特务大队李静波的大队附。后来我也到马边黄昌俊那个大队部挂了个名。

1933年，四川的“二刘之战”中刘湘打败了刘文辉，接替刘文辉当了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退进西康。雷马屏峨一带就由二十四军的防区变为二十一军的防区。刘文辉所委派的雷马屏峨各县县长当然就一律撤换为刘湘的人。马边县长撤换了，大队长李静波垮台了，黄昌俊和我也就失去了依附，于是又只好去找廖旭龄。据说，组织上安排他负责马边的地下工作，他没有随二十四军退入西康，而以办屯垦为名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在马边濠池子办了个“拓边垦社”（在这里顺便说一说，廖旭龄后来因与另一个地下党员黄雪峰私人关系搞得不好，解放前被国民

党杀害了)。当时，廖旭龄去找了住在乐山附近的杨超。杨超要我们回雷波，利用乡亲关系，先找个立足点，一面从那边地开发，做些有利于民众的事，一面在农村中组织武装力量，声援余洪泽在川滇黔边界“南六”一带建立川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廖旭龄还把杨超在乐山的联络地点告知了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杨超，但对这种关系重大的指示是相信廖旭龄不会传达错的。

1933年7、8月间，我同黄昌俊回到了雷波。遵照杨超的指示，我们一回雷波就开始物色我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地方势力。不久，我们就看中了李葆全这个人。

李葆全，书名李汝珍，是雷波城郊南田坝（原城乡）人。当时他已有三十多岁。他不仅在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并且还到宜宾、成都读过中学。在当时的雷波说来就已算有一定知识和见解的人。他为人直爽，有正义感，在乡人中颇有声望。因此在几年以前县政府就委他为顺城乡的团务大队长。我虽然家住城内，但生活是靠顺城乡的几亩田地收租吃饭的。因而他也是知道我的。顺城乡有所小学，李葆全又是小学的校董。我和昌俊找人从侧面向他传话说，我们很愿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点工作。李葆全就主动来拜访了我们。经过几次洽谈，他决定邀请黄昌俊为顺城乡小学的教师，同时他还聘请由黄昌俊推荐的雷波师范班同学刘季芬（女）、甘子杰（女）、刘桐章、李桐液和我为教员。顺城小学位于南田坝中心的天堂庙，距县城只有二三里，是附城几个小学中条件最好的一个，有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学校就办得更加生气蓬勃。坝里一些人家也把孩子送到顺城小学来了。

李葆全做事很认真，他每天都要来学校看看。他家就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清海子边，我和昌俊也常于晚间到他家去闲聊。开始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后来渐渐就谈到兴办一点小手工业上来。李葆全家有田地三四十亩，葭房一院，还有一座煮酒的酢房，一盞榨油的油房。在当时的雷波农村中说来，已算得上是个殷实之家。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粗茶淡饭是绝不用愁的。但李葆全很干脆。他对于兴办工业有了兴趣，就把田地的绝大部分以八百两白银典当给云南迁来的一家李姓农民，决定在天堂庙内建立一个手工织布厂。他自己任经理，负责对外，以黄昌俊为副经理负责生

产安排，并随即派人赴云南昭通采购织机部件和棉纱。雷波是汉彝接壤区的一个重镇，大小凉山彝家，每年把牛羊皮、猪鬃、黄连、贝母等山货药材运到雷波换取锅、布、盐、钱，这是雷波商业的大宗。但锅布盐铁这些商品雷波本地并不生产，都靠生意人由叙府、昭通一带贩运进来，转卖出去。我们选定搞个织布工厂，对地方本来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料到这竟引起一场重大惨案。

刘湘当了四川省主席，委派贵州人吴峻之为雷波县长。这个吴峻之是刘湘的土特务系统“清共委员会”分子。他到雷波后第一次召集各区、乡、镇长开会时就别有用心地说，雷波为蛮夷之地，应特别防范异党分子利用凶悍的蛮夷作乱。他说：单只蛮夷作乱是不足为患的，但如果有异党分子从中组织，大家的身家性命、财产就不堪设想了。吴峻之召开区、乡、镇长会议，我们同李葆全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本地本方，会议刚完就有人把他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青。黄昌俊才二十岁多点，我还不到二十岁。黄昌俊在嘉州书店受到杨韬的启发，对共产主义尤其是江西红军、瑞金苏维埃政府的作用知道了一些大概，并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但他也还只是个候补党员。我连杨韬也没有见过，只是听说放一把火就算暴动，暴动就是革命，革命就会与汤武一样成就应乎天而顺乎人的大事业。我们对于共产主义革命只是朴素的激情，没有斗争经验，一听到吴峻之“要严防异党分子”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反感，就同他有了对立情绪。

当我们同吴峻之处于对立地位后，他的所作所为就使我们特别厌恶了。

吴峻之是1933年春末夏初到达雷波的。他一到雷波就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1、增收田粮附加税 雷波农民租耕地主土地，除秋收后按契约规定向地主交纳地租外，其他额外税捐概不负担，所以田粮赋税历来会由粮户向官府交纳。吴峻之上任后规定，从民国22年（1933）秋收起，所有佃农、自耕农通通要附征田粮正额的百分之二十。这不仅打破了雷波的传统，使种田农民增加了二

层粮税，使农民直接与官府发生了矛盾。

2、增收百货捐 晋波历来做小生意的或经营土特产外运的，除必须到厘金局过秤的要交点过秤手续费外，其他却不纳税。吴峻之布告金县：凡经营商业的，商店要按月，小摊贩要按值交纳货物税。并在金河沿岸出入云南的渡口如那皮渡、燕子岩、中心场、狮子坝等地设立税卡，征收过境税。这不仅使沟通有无的商家赶溜溜场营取一点蝇头微利谋生的小贩不满，并且也使因征税而引起物价上涨之害的城乡民众产生了不满。

3、设立地方常备团。晋波是边地，前清时就设有营防军，但其供需都由国库开支。民国以后，军伐割据，但驻军粮饷也从未向地方征派。吴峻之到任后，为了镇压民众，巩固其统治，特藉口“防夷”，巧立名目，设立地方武装常备团。他规定“常备团”由各镇乡分期抽调丁壮，自带武器到县城集中，归县府直接指挥。所有团丁伙食费用，概由各乡镇摊派。这一决定，由于要加重各乡镇的负担，引起全县老百姓的反对。

吴峻之这些政已为我们提供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有力论据。通过事联，宣传鼓动，揭露吴之罪行，在部分群众中产生了共鸣。

吴城附近，除了城厢镇，还有顺城（南田坝）、靖远（米脚槽）、里平（哪里沟）、顺河（背杠坪）、乌脚等五个乡。顺城乡紧接城南，靖远乡紧接城东，两乡关系历来就不很融洽。里平乡虽与靖远乡接壤，但与城内绅粮的关系较好，是与城厢一致的。乌角与顺河两乡同顺城毗连，李葆全完全可以号召。那时乡下还有保和甲的制度，大体十户为一甲，但一保却不只十甲。乡就是保，乡设正副团正，或称为保董。因此，顺城乡实际仅是一个保，二百多家人；靖远乡较大，有三百多家人；里平仅有百十来户；乌角和顺河都不过百户。据说那时晋波只有三个半场。黄琅、天姑密（永盛）、牛吃水（汶水）为三个场；海瑞坝为半个场。全县只有七千多户，二万多人，而城厢就占了一分之一，约有七百多户，二千多人。

那些年辰晋波的文教事业也是很落后的。微乎其微大学毕业的都不愿回家乡，以致全县各乡镇没有一个大学生。因而办不了

中学。小学的高年级全县也只有城关小学的两个班。黄琅离城一百二十里，永盛离城九十里，坎水离城三十里都只办有一所初级小学。这些地方的孩子，初小毕业后，要读个高小就得去县城。而县城高小的师资，除了两位秀才，最高学历也不过是成都的某某中学毕业，连个师范生也没有。由于教育事业落后，乡里的小孩只能在私塾里读点四书五经，个别人家的孩子读完四书五经，在乡里无书可读才到城里去读“官学”。因而高小毕业生已经是二十多岁。幸亏热心教育的几个老先生想得出办法，把高小毕业后又无力到成都升学的青年，隔两三年又集中起来开办一个“师范班”，学习一年半载后就分配到全县各小学成乡间去担任教员，慢慢用“读新章”的官学去挤掉那些“私塾”。这个师范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当然还不及内地简阳毕业生。附城五个乡中除顺城乡外，其余四个乡连师范班毕业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因此，不仅乌角乡的汉团保正李万寿，彝团保正白兴元不识字，就连大名鼎鼎的靖远乡团长付正兴、大队长张顺才也是一字不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李葆全不仅读过四书五经，而且还到成都读过中学，当然就难免要受到别人的忌妒了。

靖远乡团正付正兴，大队长张顺才，不管谁来当县长他们都是服服贴贴的。反抗官府的思想在他们那儿是不会有。他们对于“夷人的骚扰已见惯不惊。他们都是乡中的户有地，住宅还有碉楼，有围墙，也有自卫武器，夷人是不会去侵扰他们的。但听吴峻之说：共产党要打土豪、分田地，比夷人可怕十倍，他们就惶惶然了。因此，他们把吴峻之视为救命恩人，对吴峻之忠心耿耿，就一切听从吴的摆布了。

李葆全把田地典当来办织布厂，这不仅引起吴峻之的怀疑，也引起城乡各界人士的议论。1933年9、10月间就有流言说：南田坝有共产党在活动；李葆全已被共产党包围。甚至有说李葆全是共产党。这时我们就注意到付正兴、张顺才经常在县府进出，而且还感觉到吴峻之已派人在跟踪我们。我们一伙年轻人，经不住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流言非语，要求李葆全采取果敢行动。于是李葆全在他家碉楼上开了一个会来研究对策。参加人员有李葆全、黄昌俊、文乾庚（文健）、李桐芬、李桐浓、刘季芬共六人。在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如不抢先一步，就会被动挨打。结果决定立即准备进行暴动；除掉吴峻之，夺取政权。成功后，封锁沿江渡口，背靠凉山，坚守胥渡城。一面派人去乐山找杨超，一面派人去“南六”联络余洪泽。下一步就出击屏山马边，建立川滇边革命根据地。万一失败就退到五宝寨子、千万贯一带。必要时就渡江过云南，占据永善进行游击活动。

会后，由李桐芬、李桐浓负责组织顺城快枪四十支，富农农民五十余人，以防夷出抗为名，每晚在天竺庙小院内进行军事训练，并对其中的一部分骨干讲一些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农民才能翻身的道理。

这时，吴峻之也在积极^{进行}准备。他除抓住靖远乡的付正兴、张顺才外，并先后召集黄琅、汶水、永盛三镇的民团大队长到县城开会。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为了先发制人，决定在腊月初十晚上^{进行}行动。具体行动是：由李葆全、黄昌俊、文乾庚、李桐芬四人，各带手枪一支、匕首一把，直入县府击杀吴峻之；李桐浓、刘华芬带领人枪五十条，为了不使城内民众受到惊扰，暂不进城，在南门外听候接应。等第一步击杀吴峻之得手，城外入枪即进入县城，宣布胥渡独立。

腊月初十日黄昏时，李葆全我们四人先后去到青龙岩。先到黄昌俊家。在那里吃过晚饭，等到二更时我们都换上新军鞋，携枪实弹走进青龙岩一看，衙门口一带已无人影。我们进^入城毫无阻碍地插入三堂吴峻之寝室。我从窗缝中窥见吴峻之正同永盛镇民团大队长邓若华抽大烟，吴靠左边，邓靠右边；临窗的条几桌旁，有一个背手枪的弁兵在擦马灯。这时，我觉得两厢内^有响，以为是已有埋伏，来不及商量，与李桐芬同时捞起门帘^开枪射击。不料枪声一响，将油灯震熄，顿时失去了目标。这时厢内已响起了对方的枪声。葆全叫“撤”。我们原已商定，进二堂后如发现对方有备，就由二堂侧门向^撤家院子撤退。撤退时葆全断后。我同李桐芬、黄昌俊刚过二堂通向^撤家院子的巷道时，对方已开了五、六枪。我们在^撤家院墙下等了一阵，不见葆全出来，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但黑夜中也无法回去寻找。只得绕墙经^撤家菜园直插东门，^撤城回到南门外李家油房。随即派人流

城打听李葆全的下落。十一日拂晓，打听的人回油房说：葆全已在县府二堂牺牲了。我们立即商定：第一、办理葆全的后事；第二、立即动员顺城乡民众进城找吴峻之算帐，说李葆全是吴峻之请去谈话被杀害了的。

腊月十一日上午，我们同顺城乡民众百多人进入县府时，除守监狱和守门的几个勤杂人员外，衙门已是空空的。我们问到一个差人，他说吴峻之和两个受伤的人在天亮前已由靖远乡的人护送到米脚槽去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吴峻之早已在防备我们，他除随身的五六个警卫外，从腊月初起就由靖远乡每夜派几个人来县衙所差，以防意外。我和李桐芬只是打伤了邓君华和擦马灯那个弁兵。吴峻之所到枪声就滚下床爬进侧门后面的小屋去了。靖远乡的团丁，白天做活累了，黄昏时来到县府就纳头便睡，他们听到枪声后，起来乱放了几枪，没想到就把葆全打着了。吴峻之的士兵们，每夜用一个人当值，其余都去打牌吃酒，要到三更才回，所以我们就如^人鼠无境地进入了三堂。

可惜我们当时太没有经验。行动前就没有作过调查工作，虽然借给了一支手枪，但他把李借枪的事向吴说了。李葆全对灯河、乌角两乡是有号召力的，但干这样大一件事也没有调集两乡武装一起发难。李事前有人曾建议，对城内个别的开明士绅通个气，同时对一些有交情的年轻人取个联系，但李葆全说：“语以泄败，事以密成”与绅士通气就等于与虎谋皮。李事时又没有记

五十多人枪一起冲进衙门，打起灯笼火把，把吴峻之拉出枪毙。如果把吴峻之枪毙了，即使李葆全牺牲了，黄昌俊和我们几个撑不起“独立”的场面，至少李桐浓、李桐芬是不至被害的。总之，没有共产党全面周密的领导，这种“放一把火就算革命”的幼稚行动，无疑终是会招致失败的。

腊月十一日下午，我们将李葆全的遗体运回清海子他的家中，立即从简殓葬。当晚我们就在李家油房同葆全的母亲和妹妹商量下一步的办法。由于吴峻之还活着，靖远乡已站在他那边，葆全又牺牲了，他能号召的力量，我们运用不了，硬拼或退到千万贯一带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决定：1、由岳母将葆全牺牲的消息通知他在乐山苏溪的二哥李仲云；2、由黄昌俊、文乾庚到乐山找共产党员杨超请示今后的办法，并到成都找旅省同乡会印发代电揭露吴峻之的罪行，说吴峻之请李葆全到县衙说话就将李枪杀了；3、李桐芬、李桐浓、刘季芬转入地下活动。第四天上我就同黄昌俊离开了雷波。

二、起义失败后的结局

我同黄昌俊在黄琅住了一天，主要是宣传揭露吴峻之的暴政。到了黄琅，昌俊因要先到乐山找杨超，叫我在黄琅住几天好同亲友宣传吴峻之的罪行，约好在乐山的会面地点他就走了。不到三天，雷波的消息就传到了黄琅。

1、吴峻之已带领靖远乡团回驻县衙；

2、吴峻之已下令封锁沿江渡口，禁止任何人出境；

3、悬赏一千元捉拿“李葆全余党”黄昌俊、文乾庚。

悬赏告示在黄琅街上贴出后，同学赵德润（后来在1942年因共产党案，在押解雷波途中被杀害）、周继元、徐均留等就打听到：大岩洞已有人驻守，界子坝渡口已过不去了。他们的意见只有到海坛坝暂行隐伏，再想办法。第二天他们找了渔船逆河过马湖到我的亲戚欧家。刚吃过晚饭，我正同大姑父的弟弟欧克德商量如何出境的问题，突见三个人从巷口向欧家走来，我回到床头拿了一把砍柴刀，就上二楼一堆包谷里藏起来。只听来人声称，我是县政府侦缉队的陶华元，奉令捉拿共产党分子黄昌俊，这乾庚的。刚才在街上听人说，今天有个年轻人到你家来了，叫

出来认一认。欧克樵说：我这里每天进出的年轻人很多，不要乱说。陶华元说：那我们就要搜一搜。说着，一个差役就上了楼，我紧握刀把，准备如被发现即将伺机夺路而出。好在时已黄昏，楼上光线很暗，欧克樵也跟在差役后面上了楼。这差役大概也知道欧家在海坝坝是不好惹的，随便看了看就退下楼去了。陶华元带着差役离开欧家时故意说：我们今晚还要到黄琅去。我下楼与欧克樵么爸商量，估计陶华元是还要在海坝坝继续打听我的下落的。因为陶华元知我同欧家是至戚。趁他们还未布好网，我应立即离开海坝坝才行。于是由欧么爸安排，又找渔船连夜送我过马湖到坝口李家。李家老人已七十多岁，他说他不仅与欧家是亲戚，还是我祖父文爵五的朋友，叫我放心。第二天，老人去黄琅赶场回来，带回场上几个朋友送我的路费。当晚半夜，老人就由小路送我到匡海坝黎家。我们到黎家时，一个中年人已准备好干粮和草鞋，原来是李老在场上就同他约好了的。略坐片刻，李老说：黎大哥送你，只要翻过高家山到屏山夏溪就安全了。我们趁黑上路，快到山顶时黎大哥说：已经离人家户很远，不会被发现了。于是找了一个可避露水的地方睡了一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进入了大森林。下午才出林到达两河口，在一个姓陈的家里过夜。第三天翻土地坎下西宁河，下午安全到达屏山夏溪场。第四天早晨我和黎大哥分手，他走石角营、冒水孔回黄琅，我则走中郝过五子山经为去乐山。

我到乐山已是腊月底，在约定的地点找着黄昌俊。他到乐山后已将雷波事件函告在成都的同乡谢崇等，请求声援。关于揭露吴峻之的代电、传单已拟好交印刷厂，约定一周后取件。但使我们最丧气的是没有找到杨韬同志。黄昌俊到乐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约定与地下党接头的地点找杨韬，但联络人说：杨韬已四五个月未来过。并说：杨韬没有说明去处，也没有谈过与雷波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

1934年新春，我们本是打算在乐山将印刷的代电寄出后即上成都的。不料正月初五的晚上，我和昌俊经过东大街夜市时，突然有人喊：捉共产党！我一看，有两支手已抓住昌俊的领口。好在夜市正热闹，人多拥挤。我趁人群混乱中侧身进入一个茶馆，

回头一看，抓住黄昌俊的正是雷波侦缉队长陶华元和三四个差人。我从茶馆后穿进了一个小巷。我考虑到住处是不能去了，于是去息尘旅馆找杨寿轩，但杨出街去了。杨是雷波彝族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因吴峻之要赦释他才跑到乐山来的。前两天我们已将雷波事件向他说过，他表示必要时就去成都同我们一起呼吁。未找着杨寿轩，我不敢在城内久停，估计陶华元他们抓住黄昌俊一定会送乐山县府，一时还不会到街上来找我，我于是就乘黄包车出高北门，在张公桥一家鸡毛店住下来。第二天我装病不出街，就在旅馆里盘算下一步如何办。这时我想起了昌俊的朋友方子良，他在二十一军驻峨眉的一个旅部里当副官，也是我的熟人，只有去找他。下午，店主人把昨晚在东街上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事当成新闻告诉我，还说城防部要在全城旅馆搜查那个跑掉了的共产党。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我就起身去峨眉山。我住在旅部倒是安全了，但方子良曾几次托人去乐山打听昌俊的下落都无结果，这使我一直就放心不下。到了二月初，方子良他们这个旅奉命移防井研，我也随旅部一道行动，在过乐山时，方子良碰巧会着一个城防部的熟人，才知昌俊被抓后关在乐山监狱里，俾城防部的干预。雷波侦缉队未能将人捉走，案子就暂时拖下来了。

那些年底，凡牵涉到共产党的案子总是雷厉风行的。我到井研半个月，一天黄昏时分方子良给我说，今天收到四川督办公署对你的通缉令，幸好我是抗星副官，把它压着了。他说他已找好一个在连里当班长的同乡陈桢，今晚就送我绕道仁寿去他的彭山家中暂避。他还说，他在明天早上把公文交上去后也要立即离开部队。因为我在旅部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朋友，他不走，上面追究问他要人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同陈桢就星夜离开了井研。第四天上午，我们到达彭山时方子良已经先回到家里了。方子良为了一个被通缉的朋友面甘担重责，并不惜离开部队，使我心里既感激，又难过。我决心不再累赘他，立即上成都。他给了我足够的旅费，我们就分手了。

我到成都，直接去到西御街谢崇阶家。我把雷波事件的经过，照我们拟好的代电内容述说了一遍。我在旅蓉同乡们面前也是交

定“吴峻之请李葆全到县府谈话，就把李枪杀了”的。根本不敢露出与廖旭龄和杨韬的关系。谢崇阶听后告知我几点：

1、他收到黄昌俊被抓后在乐山狱中的来信时，正巧二十一军驻乐山城防部的一个团附苟吉堂在成都。苟吉堂是崇阶日本士官校的同队同学，崇阶托他帮忙营救黄昌俊，苟吉堂第二天就回了乐山，他用城防部的名义把昌俊挡下，不让押解回雷波。现在这个案子，雷波管不了，乐山不愿管，已悬在乐山无人催问。

2、在成都的朋友曾以旅省同乡会名义两次向督办公署申诉和控告吴峻之，同时他还托了一些军政方面的有关朋友向“清共委员会”疏通，说明雷波事件与共产党无关。看来案情已缓和下来了。

3、吴峻之得到靖远乡的支持，回县府后大肆搜捕，扩大军威，造成全县一片恐怖；李桐芬、李桐浓已惨遭杀害，刘季芬下落不明，孙绍斌尚关在监里。

4、他们二十八军第七师也收到了悬赏捉拿共匪文乾夫的通缉令，并常有不明身份的人来他家里查问有无雷波人来过。

最后，谢崇阶说，看来成都你是不能住的，只有到金堂郭淡如那里，或到什邡李仕安那里暂避一时才行。

于是我在第二天一早就离开成都去了什邡。

什邡是一个边陲小县，公开的消息很不灵通。我是潜逃避祸的人，连名字也改成文健，当然不敢四处发信打听消息。因之在什邡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真是坐针毡。

1934年4月底，李仕安接到旅蓉同乡的信，说雷波事件案情大有好转，听谢崇阶说成都情况已大有缓和。我即离什邡回成都了。

几个月来，由于旅省同乡的呼吁，尤其是谢崇阶的一些朋友向有关当道说项，五月中旬，督办公署对雷波事件的处理下达了正式公文。吴峻之以“不察边情，激起民变”的罪由而被撤职。黄昌俊在乐山监狱无罪释放。

笼罩雷波的乌云散了。顺城民众在清海子边李葆全庭院之侧，建立了纪念李葆全、李桐芬、李桐浓的“三烈士祠”。一场公案，就此了结！

碧波历史人物穆瀛洲的发迹和起义经过

江 国 梁

在军阀混战中起家

穆瀛洲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江津县，家境贫困，幼年时父母双亡。流落江津县城当“茶房”，一九一六年二十岁时，因参加赌博，把一年的工钱输光了，持刀抢了“皇粮”（公粮款），成了通缉犯，跑到贵州当起“绿林好汉”，抢烟帮，卖枪弹，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实力越滚越大。后因抢贵州新二十军杨森部队的武器库，惹了祸，站不住，拖起人马跑回四川。一九二九年被刘湘“招安”收编为边防二路军，并封他为师长，下属四个团，从此他就有了靠山，又有了军职。

一九三三年，刘湘和刘文辉争霸四川，老百姓称之为“一、四（21、24）军开仗”，在“安川战役”中，穆奉刘湘之命，进攻刘文辉之夏仲实师，夺取峨眉，经围攻打垮夏师，占领了峨眉县城，为刘湘立了汗马功劳，命其驻守，封为城防司令官。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刘湘怕抵挡不住红军，同意蒋系中央军入川设防，导致“引狼入室”。为阻击红军，刘湘要穆驻防犍山县之松林一带，穆为保护实力，避免与红军对战，以武器不好，战力不强为由，提出与刘的模范师廖海清交换防区，驻守屏山至雷波一带江防。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为了逐步削弱刘湘的实力，提出裁编其所属杂牌部队一、二、三、四路军，在中央军大兵压境之下，刘被迫接受，令穆的部队集中宜宾裁编，其师长职务也被裁掉。

办 垦 经 过

在部队裁编时，穆隐瞒了百多人枪，由其舅子王建修（团长）带进碧波的黄琅。以穆在宜宾的盐号“同生公司”为招牌，在雷口、马湖、唐家山、肖家岩、谷米、岩丰坪等地办起了垦场。刘湘为安抚穆，暗示其进入边远山区重组队伍，待今后有事再拉出来，并送给200多箱子弹，派人由金沙江水路送往黄琅。穆不甘寂寞，在宜宾、成都等地活动，想通过老关系找个地方或军队

职差，因谁也怕担风险，不敢留用。一九三八年穆才进入雷波县柑子坪办“同生垦殖公司”，担任总经理，并制定了招揽垦民的办法，开垦头年产十抽一，次年产十抽二，三年产十抽三为止，保护垦民人身安全（不被逼债，担丁）等。垦民从四川、云南及外省各地不断涌入，不几年先后办起十九个分垦场，垦民（丁）达万多人。由于单一粮食，穆感到租、税收入微薄，经济和军力扩垦不大，于是提出种大烟，一年比一年种得多，烟税价值也高。购买枪弹，实力不断增强。一九四六年，雷波县长和甘、刘、郭、谢四大绅粮眼红，向四川省府告状，控告穆侵占“民地”和大种鸦片烟，要求制裁。省府兴师问罪，派遣七九军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开赴黄琅，向穆提出要200担大烟，因短时间如数交清实难办到，穆因避逃走。七九军开火攻打唐家山、^{马湖}、柑子坪等分垦场，铲掉了部份大烟。后来，省府鉴于赶走穆对稳定“边防”不利，又令七九军将穆找回，同时调解“场民关系”的矛盾，叫穆把^{马湖}、马湖、唐家山、磨丰坪等分垦场交给地方，一律撤到柑子、双河地区。从此，穆把“同生公司”更名为“复兴垦场”，直至解放前夕。

解 放 起 义

穆因多次受国民党的排挤打击，对蒋政权不满。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穆和妻子用收音机收听战况，私下议论国民党不久将灭亡，酝酿应变良策。一九四九年九月穆奉四川省府令与刘树成（沐川县垦场场长）一起，在^{马湖}为县清溪镇组建雷、马、屏、峨沐边区守备行营司令部，刘树成为司令，穆为副司令，他将所属各分垦场兵丁编成一个团三个营的队伍，开赴^{马湖}为县就职。边时我解放大军已向西南挺进，穆和刘积租商量起义，当我军解放乐山时，穆、刘二人率所部在^{马湖}为起义。经派人联系率解放军的命令堵击国民党的部队。穆亲自率领一个营和刘树成部一个特务连的兵力，对宋希^彦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俘获该部官兵800多人。继后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急行军插山路捷径，在马边县蔡、安二山阻击宋部一个特务营。配合解放军全歼该营，俘获四百多人枪。在解放军三十师师长马忠全同志的指示下，穆秘密派人送“手令”给柑子坪垦场代联负责人XXX

组织力量伺机攻打陈超所部。还同刘树成商议，派副官李维国（带了一个班的兵力）到黄琅同陈超谈判，提出“投诚解放”的条件，陈超顽固不化，枪杀了谈判代表。在解放军进军雷波时，穆推荐熟悉雷波地形的人配合部队，为消灭陈超解放雷波作了一定的贡献。一九五〇年春，战争基本结束后，根据穆的表现，组织上安排他到川南行署学习三个月后，任命穆为川南木材公司的副经理。

（注，穆的情况系长期跟随他的老部下秦质彬、王青云等人提供，他们都已八十几岁了。）

雷波“民国时期 工商管理机构 的演变”

段 联 辉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设立实业部，统管工商。雷波厅设庶务课，下设实业股管理工商、农、矿、蚕桑等。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雷波厅改为雷波县，设知事公署，隶永宁道。雷波县商会曾设商事公断处，专事解决商事纠纷。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根据民国中华政府颁布的组织法，将雷波知事公署改为县政府。分设教育、建设、财务局。隶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乐山）。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遵照县政组织大纲规定，改局为科。建设科是县一级的工商管理机构。

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起，对工商事务管理的机关分别有：田粮管理处，负责管理军粮和地方粮秣的征集、储运、配给。税捐处，管理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和征收国家税收。劝业会，组织当地名产、特产到省和外地展销，沟通各地间的物资交流。度量衡检定所推行“度政”制止奸商非法牟利。这些机关与工商管理机构相互配合，各有专司。

工商业及其组织

雷波县地处四川西南边陲，位于凉山州小凉山地区。彝汉杂

~ 1 ~